

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 及其历史意义(1949—1960)

范兴旺

[摘要]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全面领导的一项面向广大农民群众的大规模文化解放与普及运动,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土地改革时期,农民扫盲运动主要以“冬学”尤其是“速成识字法”为主;1953年,农民扫盲运动逐渐向常年业余学校转变,通过配合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的学习与生产统一起来,逐步走向稳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面积铺开对扫盲提出了更高要求,“注音识字法”成为农民扫盲运动最重要的法宝。总体上看,三次农民扫盲运动体现了先发展、后调整,边发展、边调整的特点。历年的坚持让新中国的文盲率从1949年的80%降低到1982年的22.8%,三次农民扫盲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关键词]农民扫盲运动;新中国;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1)11-0064-10

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全面领导的一项面向广大农民群众的大规模文化解放与普及运动,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成为一场全民性文化前进运动,以“组织起来”的方式满足了农民文化解放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体现了党的人民性价值诉求。揆诸现有研究,有关新中国

成立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著述颇丰。这些研究从教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微观领域探讨其利弊得失,推动了对“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议题的讨论。^①本文力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的梳理分析,揭示扫盲教育对重塑中国广大农民精神世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意义,进而希冀为理解“中国共产

作者:范兴旺,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学术界代表性观点有“三次高潮说”和“四次高潮说”。“三次高潮说”认为三次扫盲高潮分别出现在1952年、1956年和1958年,参见董纯朴:《中国成人教育史纲》,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15页;“四次高潮说”主张四次高潮出现在1952年、1956年、1958年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四次扫盲高潮是在山西省万荣县的注音识字经验带动下掀起的新一轮的扫盲高潮。参见吴珏:《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四次扫盲高潮》,《湘潮》2007年第12期。

党为什么能”提供一种历史视角。

一、农民扫盲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层面看,扫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育未普、民智罕开”影响了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自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先进分子为救亡图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在精神文化方面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太大影响,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对新文化运动乃至对革命更多的是隔阂、漠然甚至误解。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考察时就做出过两个判断,即“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1](p.39)}在旧中国,多数农村依旧被贫困、落后、愚昧所笼罩:农村中“典妻”、卖婴、“溺婴”等悲剧屡屡发生;封建、迷信、愚昧的思想意识为广大农民共有。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揭示了“病中国”里的“愚昧农民”问题,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重大课题。愚昧与文盲虽不等同,但二者之间仅一隅之隔。文盲既是愚昧的产物,又是产生新的愚昧的土壤。先识字,后明理,才能有效动员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阶级投身民主革命,使农村和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改变。

“五四”以后,面向农村和农民的“扫盲”逐渐成为共识。孙中山认为中国农民主要特点是恒守古法、不思变通、不敢为自主、凝滞不前、一盘散沙,故在临终之时,他把“唤起民众”作为遗嘱内容之一。而要“唤起民众”,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首要问题就是教会他们识字。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力图从民众识字入手,强化国民政治教育,但终究未能全面有效扫除农村文盲。民间知识分子出于社会改造的动机,从事细枝末节的教育改造,总体收效甚微。至于西方传教士,他们不遗余力地开办学校、出版报纸、印刷书籍,其初衷本就不在于提高中国的国民文化素质,对文化教育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十分有限。

这样一来,扫盲的历史重任自然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党的农民扫盲教育承继了马克思主义扫盲教育观,是“为革命办教育”,是以促进民主革命为目的的教育,即通过扫盲教育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凝聚革命力量,为革命斗争服务。因此,扫盲成为我们党团结与教育农民的有力武器。也正因如此,扫盲教育塑造了农民阶级对党的认同,比如通过对农民广泛的识字教育,为土地改革的顺利实行提供了思想条件;因军队里很多穿军装的都是农民出身,通过在军队里开展识字教育,提高革命觉悟与革命斗争的能力;通过对农村党员普遍的识字教育,清除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通过教育农民而发动农民,通过帮助农民而依靠农民,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然,在战争环境下、在局部地区开展扫盲所取得的成绩只是相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人口尤其是农民文盲数仍居高不下,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难以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国民普及教育的发达,而且后者是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因此,使工农掌握文字和文化的扫盲教育,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关键作用。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呼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p.1477)}对于当时农民的状况,毛泽东认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3](p.179)}广大农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以及工业战线与国防部门的主要后备力量,文化水平却相当低,这种情况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发展,严重影响新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面对农村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思考如何将建设新国家的理念传达给农民,以寻求他们的认同、支持和参与,进而又如何将文盲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体培养成符合新国家建设要求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我们党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二、农村土地改革时期农民扫盲运动：从冬学到速成识字法（1949—1952）

从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同老解放区，中央政府共没收征收了大约7亿亩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约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4]p.100}土地改革运动大大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随着人民当家做主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广大群众“文化翻身”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盲运动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解放行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农民扫盲运动主要以“冬学”尤其是“速成识字法”为主，起到了良好效果。

冬学最早是陕甘宁边区农民在冬季农闲时节开展的一种“文化翻身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区“团结教育广大农民的有力武器之一”。^{[5]p.1}1949年12月5日，新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向全国发布《关于开展今年冬学工作的指示》，认为冬学是提升农民素质的强有力武器，决定在全国推行农村冬学运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教育部名义签发的第一个文件，党和政府对冬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第一，从组织形式上看，冬学运动通过党的领导，以各类会议为形式动员了广大群众。各地政府部门纷纷成立冬学委员会加强领导，同时召开各级群众会议，如乡村干部会议、党团员会议、妇联会议、村民大会、老人座谈会、学员家长会、婆婆会等，反复向农村群众说明上冬学的意义与识字的重要性，消除农民群众“怕上冬学耽误生产”的顾虑，发动农民踊跃入学。群众大会一般安排积极分子现身说法，“忆苦思甜”，诉不识字和没文化的苦，找不识字的根源。除集中宣传动员外，各地还广泛采

取个别谈话、逐个说服的办法。政府部门设有专门的冬学宣传员，他们走村串户、沿门逐户，专做上冬学不积极者的思想工作，在劝说动员的同时，也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从服务主体上看，党和政府动员了各级知识分子参加扫盲运动。各地政府组织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参加新中国建设。党和政府选拔在乡知识分子，举办冬学师资培训班，施以关于政治、时事、生产、文化知识及教学方法等的培训，把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合格的义务冬学教师。例如，1950年底，浙江省宁波专区冬学运动开始后，各地有大批农村知识分子投入其中，奉化县433人，鄞县427人，定海县102人，象山县南庄区37人，余姚县临山、周朝、城北三区111人，镇海县庄市、郭巨两区105人。^[6]从1951年的中南区各地的师资培训情况看，湖北孝感县于10月底训练了1044人，江西彭泽县于11月底选训了178人，河南确山县培训了400人。^[7]对包括地主富农出身在内的在乡失业失学知识分子的培训，缓解了冬学教育中师资短缺的燃眉之急。

第三，从教育内容上看，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当时农民的文化水平大致为三种情况：一是完全不识字，二是识一百字左右，三是识五百字以上。^{[8]p.8}因此，教育部指示，各省市可依据三种不同情况，在教育部制定大纲的基础上自行编印冬学识字课本。除1951年教育部编印的文化教材《农民识字课本》外，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编写了识字课本和补充教材，如东北人民政府文教部编撰的《农民文化课本》、中南教育部编写的《农民冬学课本》、吉林省教育厅改编的《冬学识字补充课本》、湖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写的《土改读本》等。这些扫盲教材内容编排大都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原则，生字和各课内容安排也以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少到多、朗朗上口为原则。

同时，各地还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949年,以“向农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意义,解释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解释目前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势和劳动人民的任务,讨论恢复和发展本地农业生产和克服生产中各种困难的办法”为基本内容,各地开展了“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教育和“拥护中苏友好、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巩固工农联盟以及破除迷信”等教育。1950年通过《介绍“纸老虎”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等文章,为农民讲解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关系,着重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此外,各地还根据土地改革进展情况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教育。1951年,各地根据中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彭真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着重推进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增产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并结合当地情况对农民进行关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生产互助以及新婚姻法等政策教育。

从1949年到1951年,全国农村掀起村村办冬学,人人上冬学的高潮。1949年参加冬学学习的农民达到1000余万人,^{[9]p.302}1950年“全国冬学入学农民已达2500万人”,^[10]1951年农村冬学入学人数增加至“4200余万人”。^[11]经过冬学运动,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冬学教育面向老解放区“政治翻身”和“经济翻身”后的农民,回应广大农民“文化翻身”的基本诉求,有效配合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群众动员工作,促进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有序进行。然而,农民季节性的识字、脱盲得不到后期学习巩固,不免出现“今年扫、明年盲”的局面。对此,速成识字法成为有效补充,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短时间突击扫盲的需要。

速成识字法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速成”,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最多的生字,是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在部队干部和战士学文化的过程中创造的,主要分三步:

一是学会注音字母,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二是突击学单字,先求会读与会讲;三是教、学语文课本,开展大量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所识的字,扩大了解字义的范围,直到会写、会用。195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同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积极推行速成识字法,有重点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识字运动。之后,各地农村掀起了以推广速成识字法为主的扫盲运动。

第一,从组织上看,中央政府成立了全国扫除文盲的行政领导机关。1952年11月,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以楚图南为主任的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其职责为负责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全国扫除文盲的工作,为部级建制,首次建立专管农民扫盲工作的农村扫盲工作司。中央政府还要求各省、地、县建立相应的扫盲机构,并设一定数量专职人员,负责推行速成识字法。全国各省、地、县教育部门也都设置了成人教育管理机构,乡镇配备了扫盲成人教育专职干部,村里指定了干部、教师负责扫盲工作。

第二,从主体上看,各地党委和政府举办了速成识字法师资培训班。例如,甘肃省临泽县举办了速成识字法教师培训班,抽调部分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和部分农村知识分子,集中县城学习速成识字法的基本原理,熟悉教学方法;四川省双流、华阳两县在1952年9月各抽调5名扫盲专职教师去温江专署,接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训练,他们学成回来后,为两县培养专、兼职扫盲教师各491名和1510名;福建省云霄县1952年11月在下坂村周亚夫庙举办速成识字法师资培训班,每期学习15天左右,连续举办两期,培训速成教师骨干200多名;安徽省广德县在1952年10月至12月期间连续举办了三期“速成识字法”教师培训班,每期20天,共培训教师900余名。

第三,从形式上看,各地党委和政府

织试点实验后再做大范围推广。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于1952年4—7月间先后在车道沟、海淀、清河等21个行政村镇办起了25个实验班,然后在有条件的村镇选择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半文盲青壮年作为速成识字的重点对象分批铺开。山西省忻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6月在东王家庄先行实验,实验组入村后,先在群众中开展回忆对比教育,让群众算清三笔账:一是旧社会穷人不能上学的痛苦账;二是新社会不用花钱就能学文化的账;三是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才的账。在群众普遍认识提高的基础上组织报名,采取自动报名和青、武、妇、系统保送报名相结合的方法。学员经过将近60天紧张的学习,完成教学计划,实验取得成功。经过试点试验,忻县农民扫盲工作以点带面,在全县迅速铺开。

第四,从内容上看,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学习的同时也对农民积极开展时事政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除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宣传、全面开展爱国丰产节约运动和取缔反动道会门运动之外,还对农民进行关于生产合作、劳动互助、工农联盟等教育。同时,各地还以生产模范、模范互助组和合作社为典型事例,集中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农民走互助合作化道路的好处,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更大胜利。如贵州省兴仁县交乐乡栗山寨行政村,在土地改革后,以生产工作为主要内容,结合进行爱国主义及共产主义前途教育,有效纠正了农民中开始萌芽的“松气”思想。

三、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扫盲运动:从民校到合作社办学 (1953—1956)

1953年,在冬学运动和速成识字法的基础上,农民扫盲运动逐渐向常年业余学校(以下

简称“民校”)转变。同时,随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农民的学习组织逐步与互助合作组织统一起来。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农民扫盲运动通过配合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的学习与生产统一起来,逐步走向稳定。

1953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农村停止推行速成识字法。同年秋,党和政府总结扫盲工作经验教训,对扫盲工作进行整顿。整顿后,农村扫盲由以冬学为主转为以民校为主。1954年3月,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1954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8月,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进一步提出在扫除文盲运动中,应采取集中与分散、常年学习与季节性学习、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与文娱组织相结合等形式。1955年,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改冬学为常年民校已为大势所趋,民校也使农民识字班的学习时间、地点变得更加固定,具有连贯性。

第一,在教学组织层面,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成立民校委员会。全国各地的冬学逐步转为常年民校后,为了把民校日常工作做好,各社设立了一定的组织机构,典型方法是成立民校(校务)委员会,除保留冬委会责任心强的委员外,还吸收热心学习的群众积极分子、村干部和教师模范、学习模范成为新委员。随着生产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民校在组织管理上实行统一规划、分片领导、上下配合的优势开始显现。一般做法是社管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把全乡按高级社划分为若干个工作片,每个工作片交由指定的社委会委员分工负责。全乡设总校,工作片设分校,每校设校长、教导主任各一人。文教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做适当分工。文教委员会主要负责向党政领导汇报,并想方设法解决全乡民校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校务委员会主要组织民师备课,研究教学工作,管理日常教学。这种相互配合、上下支撑的组织管理,使

民校真正做到了层层有领导,片片有人管,事事有专责。

除集中统一领导外,党和政府还充分发动群众办民校,民校通过依靠群众办学的方式得以成长发展。没有教室,就去借用民房;缺少教师,由乡政府在群众中委托聘任;教师待遇除了记工分,其余无分文报酬。例如,云南元江那诺村农民新盖了一间草房做教室,江川乐家营乡农民自动组织起来挑柴、割茅草卖钱,解决民校的经费问题。有的木匠献工修理课桌凳,泥瓦匠自发修理墙头、粉刷墙壁,妇女包揽教室清洁卫生工作。有的地方发动群众搞副业增产、反黑田、组织劝募等。大家齐心协力、集思广益为民校筹集经费。众多民校教师不计报酬,默默为扫盲工作奉献力量。

第二,在教学形式层面,民校根据学员识字情况,实行分层教学。民校有固定时间、固定学员、固定民师,坚持长年学习,农忙少学,农闲多学,按学员的文化程度分为识字班、初级班、高级班。高级班、初级班学习农民业余学习课本,识字班先教会学员1到10的数字和“日”“月”“工”“分”四个字,这样学员们就初步会用这些字记工评分了。然后,在教学中再逐步纳入农民的名字、村庄的名字、家庭成员的名字、生产生活物品的名称、农活名、作物名等,这些均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这种教学风格既契合农村具体实际,又让农民习得文化,让学员学用一致、边学边用,相互促进,效果显著。有学员学完后表示,“每天自己能记工分,心明眼亮,生产情绪更高了”,而且“学了就能看劳动手册,真解决问题”。^{[12](p.37)}

除了分班、分层教学外,民校还采用过以下三种形式,一是送字上门,例如山西省孟县蔡河村民校对孩子较多的16个壮年妇女采用“卡片教学”方法,固定“小先生”给她们每天送2个字,日积月累,逐渐增多。二是包教保学,这种形式教学出现过不少动人事例,如夫教妻、子教母,有的家庭一人识字包全户。三是

设立文化岗,在村前屋后、主要路口挂着识字牌,由识字的人轮流站岗,过此道要认字,会认的过岗,不会认的教读,会读了过岗。

第三,在教学内容层面,实行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各地在掌握以文化学习为主的方针下,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生产教育,传授诸如深耕细作、养殖牲畜、兴修水利等技术,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来看,全国民校的农民思想教育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展开。1953年重点对农民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再教育、两条路线对比教育、合作化优越性教育,集中学习粮食政策以及《互助合作政策汇编》等。1954年主要教授工农联盟、普选、农业互助合作、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购买国家公债的意义等内容,并宣传“一定要解放台湾”,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积极保卫世界和平,以提高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1955年结合当地农村中心工作,以宣传农业合作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主要内容。1956年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意识教育,加强农民对我国优先发展工业这一战略举措的理解;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树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意识,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奉献力量。

由于规模较大,组织较正规,教师由政府聘请较固定,农民学习的时间也较长,民校逐渐成为农民不做“睁眼瞎”、学好文化的好场所。然而,由于合作社、生产队的开会和业余教育大多在晚间进行,两者时间存在冲突,仍没能很好解决农民学习与生产的结合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合作社办学逐渐走上历史前台。

合作社办学有了便于解决学习与生产结合问题的条件。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合作社办学的新现象。1954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的报告》中

对此加以肯定。1955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进一步指出把生产与学习结合起来是发展农民业余教育事业的基本方向。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应根据农事季节不同情况因时制宜,有所伸缩,提倡“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假”的做法。总体上看,合作社办学有如下三方面主要特征。

第一,知识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新农具改良、记账、借贷、读报、劳动工分手册、通知、请假条、收条等具体形式,将知识嵌入生产生活环节,在扫盲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机制,重新激发出农民对文字的“需要”。参加扫盲班的农民也记工分,纸、笔和点灯的煤油由合作社免费发放,所以参加扫盲班的学员学习积极性普遍增高。各地根据“做什么就学什么、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原则,从扫盲开始,结合农业生产合作社记工分、算分配账等进行实际操作,进行生产技术教育,把合作社办成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阵地。社员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合作社在培养大批有用人才的同时,提高了干部和群众办社的信心。农民很快在办社实践中识字脱盲,学文化、学技术热情高涨。在上级帮助下,各社都设立教育基金,创办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培训班,较快解决了合作社需要的会计员、记工员、技术员等人才问题,不认识工票文字的生产小组长很快就认识了。

第二,集中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合作社、生产队办学以后,集中学习的优势更加突出,同以前相比更有利于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生产和学习,解决了农民生产与学习的矛盾。各生产合作社自行制定扫盲计划,建立扫盲班、识字组。生产合作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学,生产队长不但管生产,也要管文化学习。普遍做法是以生产队、生产大队(村)为单位组织班级教学,以便于对生产和学习实行统一领

导和管理。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对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做了具体安排。为了把更多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如“地头学习小组”“地窖学习班”“炕头学习小组”等。

第三,依靠教师与“发动群众”相结合。“以民教民”的工作方法解决了合作社办学的师资问题。除了选聘专职教师作为合作社的教学骨干外,各级政府还特别注重业余教师的培养,有效整合了教师资源。在业余教师队伍中,有七八百万是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农村小学教师以及假期回家学生。当时,党和政府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13]都加入合作社扫盲教师队伍。

四、“注音识字法”与农民扫盲运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 (1957—1960)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大面积铺开,农民更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14](p.510)}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精耕细作以及实施农村计划生育、移风易俗等都需要文化教育,这就对扫盲提出了更高要求。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1958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扫盲协会会长陈毅在全国十八省市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上指出:扫盲教育是使6亿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15]

为推动扫盲运动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一般实行书记“挂帅”,四长(县长、乡长、社长、队

长)负责,既领导生产,也领导学习。生产、学习统一安排,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各地各级党委召开扫盲大会、扫盲誓师大会、扫盲积极分子大会,成立“指挥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在工作过程中,全党动手、书记挂帅、层层包干、任务到人、全民参加、送学上门,包教包学。各地还在脱盲后进入业余高小班学习的学员中,开展了复习千遍、抄写万言、读文千章、写作百篇的巩固提高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扫除农村文盲4000多万人,1959年2600万人,1960年383.9万人。^{[16](p.1831)}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当时的农村成人参加学习的积极性确实很高,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速度确实太快”。^{[17](p.15)}这一时期的农民扫盲形式之多、扫盲力度之大、教育下沉之快、教育普及之广,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一时期,推广山西省万荣县多快好省的扫盲经验是党和政府“巩固扫盲成果”的重要举措。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注音识字法”成为最重要的法宝,而万荣县在这方面所创造的经验经山西省委上报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批示。1960年4月,中央做出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注音识字好办法,一树开下两朵花,一朵摘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话”,正是对万荣县创造的注音识字扫盲经验的生动描述,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高潮。总体上看,推广万荣经验有以下五方面主要特征。

第一,汲取经验与创新探索相结合。各地在汲取万荣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新推广方法。一是各级党委领导,公社书记亲自办学,带头学习拼音字母,并接受当场测验。二是积极培训师资,具体做法是:县、公社、管理区分级培训,采取发动中小学师生担任辅导和包教,抽调力量进行突击支援,边学边教、先学后教等办法。三是统一认识,明确方向,使学习注音识字与生产密切结合,用生

产带动学习,以学习促进生产。四是结合当地实际,创新推广方法,例如广东省设计出四套方言拼音方案,即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向全省公布,一边实验,一边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修正定稿,全面推行;在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教师针对少数民族学员学习汉语的特点,多运用直观教学方法,示范领读,循循善诱,耐心等待,在一些较难理解的地方,还适当运用民族语做辅助教学。

第二,宣传引导与典型示范相结合。各地公社开展田头动员、食堂饭后讨论、广播宣传注音识字、现场会议等,结合生产组织评比竞赛,使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逐步了解注音识字的目的和好处。凡是门牌、吊牌、标语、电影广告中等有汉字的地方,统统加注拼音字母。在推广注音识字运动中,各地评选学习模范,奖励学习先进个人,邀请脱盲学员现场表演、做报告,发挥榜样引领作用。例如,1959年9月,在山东平原县董王庄注音扫盲现场会议期间,主办方邀请脱盲社员邢春环、傅秀英、赵金荣和王秀兰师徒四代登台表演“党的话记心间,决心达到红又专”的拼写题,脱盲学员王曰海做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的报告。在大邢王庄汇报表演时,人称“学习迷”的60岁老大娘王桂英,熟练而又正确地拼写出代表们提出的“总路线光芒万丈”,并且左右手都能写。这些新人新事提供了学好文化的榜样力量,增进了农民群众学习注音识字的信心和决心。

第三,扫盲教育与推普工作相结合。例如,浙江省桐庐县新登公社在注音识字的教学过程中,根据本地区方言复杂的特点,采用“拼音、识字、普通话”三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多比较、多练习、由易到难、分散难点”教学原则,用普通话语音教学拼音字母,通过拼音认识汉字,使学习者在识字过程中又学会了普通话。首先是识字,然后是正音,最后是学习普通话,三者各有重点,互相联系,共同促进。学习普

通话贯彻“先普及后提高,先基本后标准”的原则。福建各地采用了“学拼音、学文化、推广普通话”及“读、拼、写”两个“三结合”的办法进行教学,并结合生产采取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全国各地学习山西万荣县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自觉坚持注音识字与推广普通话相结合,一般采取边教拼音、边教识字的方法,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使扫盲和学习拼音字母一气呵成,也使回生复盲的学员在学习拼音的过程中复习和巩固了回生的汉字。

第四,词表突击与大量读写相结合。例如,河北省河间县自行编印含有1550个常用汉字的《注音扫盲词表》,把这些字分别组成若干个常用词。学员根据拼音拼出音来就能理解词意,认识汉字。教学时,事先让学员利用课外时间拼读词表和反复朗读,遇到不易记的字就标上红点或抄在笔记本上,多加练习。等到学员认识五百个以上汉字时,只念词表便不能满足要求,这时开始有计划地阅读。在阅读中,采用个人阅读和教师辅导相结合、精读与略读相结合的方法。在学员个人大量阅读的同时,教师有计划地选择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文章在课堂进行讲解,以便进一步提高学员的阅读能力。学员在开展大量阅读的同时也开展大量的写作活动。起初是练习写一句一句的话,学员们互说互写,老师说学员写,逐步引导学员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然后逐渐要求学员写出故事大意、读书心得、诗歌、便条、书信等。这样,学员不仅识了字,阅读和写作水平也很快得到提高。

第五,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在推广注音识字法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对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8月,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各地集中宣传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教育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1959年,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从1960年起,中央先后在农村

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学习为人民服务 and 奉献的精神,尤其是白求恩和张思德,教育广大农民在个人能力范围内为国家作出应有贡献。用这种精神教育农民,正是在于改造小农、提升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锻造社会主义新人。

纵观三次农民扫盲运动,可以发现其呈现出如下解决焦点问题的诉求路线:推行冬学(解决教育普及问题)→推广速成识字法(解决扫盲速度问题)→举办民校(解决冬学后续教育的空白问题)→合作社办学(解决农民生产与学习的矛盾问题)→深化扫盲运动(进一步解决农民文化需求问题)→推广注音识字运动(解决巩固问题),三次农民扫盲运动从总体上体现了先发展、后调整,边发展、边调整的特点。历年的坚持,让新中国的文盲率从1949年的80%降低到1982年的22.8%,^[18]同期成人识字率也提高到51.1%,^{[19](p.532)}使“中国的扫盲工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84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扫盲奖评选活动中,中国先后有11个单位获奖,其中有6个单位获大奖”。^[20]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第一,从农民权利层面上看,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接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苏区、边区和老解放区的农民文化教育,以“革命之手段”将文化话语权归还于大众(尤其是农民群体),颠覆式地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大众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扫盲运动在解构几千年文化统治格局的同时,让农民通过文化学习第一次在文化层面感受到了成为“主人”的意义。持续的扫盲教育客观上将农民从愚昧无知的精神桎梏中解放了出来,重构了农民的认知体系,塑造、引导、提升了中国农民群体的整体文化素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改造与

重塑。这是百年党史中一项值得书写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主动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心理支撑。

第二,从思想改造层面上看,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洗礼运动,新中国三次农民扫盲运动扫除了旧社会思想和文化的束缚,在改造小农、塑造和增添“新人”的同时,有效改变了农民旧有生活习惯,逐渐肃清了农村社会的陈规陋习,不仅扫除了如赌博、抽鸦片、裹足、包办婚姻等封建思想残余,还改造了一些游手好闲的懒汉、流氓、地痞与不务正业的小偷、乞丐、巫神。农民扫盲运动给广大农民带去了心灵的慰藉,填补了大多数农民头脑缺失文化给养的空白,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农村旧有文化,使广大农村地区形成扶贫济困、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和道德环境。原来在农村中占据主导的遗风陋俗和封建迷信思想逐渐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思想,集体主义逐步成为广大农民新的社会价值观。

第三,从社会革命层面上看,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大主题下,对新中国来说,三次农民扫盲运动正是借助改造农民、农业、农村而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一项重要举措,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及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持续十多年的扫盲教育极大提升了农民识字率,使农民获得了一种劳动生产上的自觉能动意识和建设新中国的主人翁意识。脱盲后的农村广大青壮年劳动力以纯朴高昂的激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扫盲将知识深化到劳动生产层面,推动了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农民扫盲运动致力于普遍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激发国民参与国家建设的激情、热忱与奉献精神,也为落后国家

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5]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 [6]提高文化知识,全区近七万农民涌入冬学[N].宁波时报,1950-01-21.
- [7]中南各地冬学运动逐步开展[N].长江日报,1951-12-20.
- [8]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农民冬学课本教学参考资料[M].武汉: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
- [9]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10]马叙伦.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加强今年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指示[N].人民日报,1951-11-13.
- [11]马叙伦.三年来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N].人民日报,1952-09-24.
- [12]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编.扫除文盲工作经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
- [13]林峰.进一步开展扫盲工作,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N].光明日报,1956-11-16.
- [1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15]扫识字盲文化育科学盲[N].人民日报,1958-03-07.
- [16]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下)[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 [17]廖其发主编.当代中国扫盲和农村成人教育的回眸与前瞻[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18]胡鞍钢.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J].学术界,2020,(2).
- [19]魏礼群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大事典(1978—2015)(第4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
- [20]郝和国.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J].党的文献,2001,(2).

责任编辑:图 图

attitude, resulting in defeat and loss of sovereignty; the CPC persisted in ac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sistance and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war. (Wang Yan and Cheng En-fu)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Farmers by the CPC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1949–1956): Rural construction is a long-standing historical issu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hose focus l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farme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PC took up “human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and carried out a 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through cultur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ypical model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etc., with the aim of cultivating new farmers who are well-educated, collectivism-oriented and politically conscious. Cultivating farmers, namely reforming the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Clarifying the governance technique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CPC in cultivating new farmer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of great referential importa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Zhang Jian-mei)

Thre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s in New China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1949–1960): New China’s thre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s were a large-scale cultural liber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campaign for the broad masses of peasan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y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During the rural land reform period, th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 mainly focused on “winter learning”, especially the “quick literacy”; in 1953, th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 gradually changed to a perennial amateur school, and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farmers’ learning and production Organize and gradually move towards stability; the large-scale sprea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iteracy, and “phonetic literac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magic weapon of the peasant literacy movement. On the whole, the thre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s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development and then adjustment; development and adjustm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everance over the years has reduced the illiteracy rate in New China from 80% in 1949 to 22.8% in 1982. The thre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s have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played a historic role. (Fan Xing-wang)

Anything Could Be Insufficient but Faith: Learning from the Party Leader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Faith: The Party leaders’ systematic and rigorous expositions on faith have always suggested the simple truth that we could tolerate insufficiency of anything but faith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 state in the new era. Marx and Engels clarifie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communist faith in breaking with the old metaphysics and in the practice of workers’ struggle. On this basis, Lenin broke down the dogmatic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t faith.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expounded the truthfulness and peoplehood of the proletarian faith and completed the spiritual reshap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CPC members,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ir main representative, have constantly emphasized enhancing faith through remembering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strengthening faith through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consolidating faith through self-revolution, which plays the strongest note of “tolerating insufficiency of anything but faith”. (Guo Hui-chao)

From Self-Criticism to Self-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Centennial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fundamental to the CPC, and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PC’s party construc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self-criticism and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has been sublimated in practice and pioneered in sublimation. It demonstrated the evolutionary logic from self-criticism to self-revolution and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for the CPC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n the new way to serving the people. The experience mainly includes: we must adhere to self revolution as an important weap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adhere to Marxist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adhere to people-centeredness as the value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as the practical trait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Hu Xu-ming and Guo Cheng)

The “Fragmentation” of Mao Ze-dong Studie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s an important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entire history of Marxist development, the category of “wholeness” characterizes the basic methodology and thinking structure of the founders of Marxism in studying social history. In view of the deviation of “fragmentation” which has been popular in Mao studies for a period of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e-affirm and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the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concept of wholeness. Historical studies are based on researching historical details, but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details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istory as a whole; historical studies cannot abstractly interpret historical details, but should examine them in the historical whole of universal connection; the studies cannot stop at the level of microscopic researching, but should rise to the level of grasping macroscopic issue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lineage and the historical mainstream, as well as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history. (Wu Xuan)

Indian Communists’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Indian Modernization: “Communism”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rce in India, a “third being” in addition to Indian secular and Hindu nationalism. In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early communist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PI), the path of Indian modernization was presented as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colonialism to liberal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group of awakened intellectuals turned to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refused to accept the western capitalist order and development path, and tried to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realize the reorganization of class rel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plit the Indian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CPI, which has been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in three Indian states, began to explore in practice a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socialist element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specially from 2008 on, the CPI has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 of Indian modernization based on a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It has further reflected on itself in an attempt to resolve real dilemmas and achieve transcending development. (Wang Jing)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